



凤凰文库
当代思想前沿系列

Thought | 资本主义文化矛盾

[美] 丹尼尔·贝尔 著
严蓓雯 译

The Cultural Contradictions of Capitalism

Daniel Bell

江苏人民出版社

丹尼尔·贝尔是当代不可或缺的智者。他对这个世界有着全面而清晰的认识。当廉价的观点挑战我们的智慧与人性时，新版《资本主义文化矛盾》拓宽了我们的眼界，用这一切武装了我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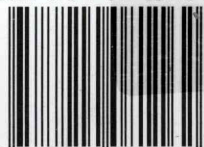
——凯瑟琳·R.斯廷普森，罗格斯大学教授

丹尼尔·贝尔已成为我们的先知。他从不夸夸其谈。他将当代历史与新词汇选出的社会学相互融合，一语道破天机：我们的躁动情绪与我们亲手打造的不计后果的文化密不可分。

——罗格·沙图克，文学与批评家联合会主席

上架建议：人文社科

ISBN 978-7-214-08116-2



9 787214 081162 >

定价：42.00元



凤凰文库
当代思想前沿系列

Thought | 资本主义文化矛盾

[美] 丹尼尔·贝尔 著
严蓓雯 译

The Cultural Contradictions of Capitalism

Daniel Bell

 江苏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资本主义文化矛盾 / (美)贝尔(Bell, D.)著; 严蓓雯译. —南京: 江苏人民出版社, 2012. 5
(凤凰文库·当代思想前沿系列)
ISBN 978-7-214-08116-2

I. ①资… II. ①贝… ②严… III. ①资本主义—文化—研究 IV. ①D033.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2)第 082545 号

THE CULTURAL CONTRADICTIONS OF CAPITALISM by Daniel Bell

Foreword to the Paperback Edition copyright © 1978 by Daniel Bell

Afterword copyright © 1996 by Daniel Bell

Copyright © 1976 by Daniel Bell

Simplified Chinese translation copyright © 2012 by Jiangsu People's Publishing House

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Basic Books, a Member of Perseus Books Group

ALL RIGHTS RESERVED

江苏省版权局著作权合同登记: 图字 10-2006-091

书 名 资本主义文化矛盾

著 者 [美]丹尼尔·贝尔

译 者 严蓓雯

责任编辑 刘 焱

特约编辑 仇子明

装帧设计 陈 黎

责任监制 王列丹

出版发行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江苏人民出版社

集团地址 南京市湖南路1号A楼, 邮编: 210009

集团网址 <http://www.ppm.cn>

出版社地址 南京市湖南路1号A楼, 邮编: 210009

出版社网址 <http://www.book-wind.com>

<http://jsrmcbs.tmall.com>

经 销 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照 排 南京紫藤制版印务中心

印 刷 者 江苏凤凰扬州鑫华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960×1304毫米 1/32

印 张 15.125 插页4

字 数 396千字

版 次 2012年5月第2版 2012年5月第2次印刷

标准书号 ISBN 978-7-214-08116-2

定 价 42.00元

(江苏人民出版社图书凡印装错误可向承印厂调换)

出版说明

要支撑起一个强大的现代化国家,除了经济、制度、科技、教育等力量之外,还需要先进的、强有力的文化力量。凤凰文库的出版宗旨是:忠实记载当代国内外尤其是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学术、思想和理论成果,促进中西方文化的交流,为推动我国先进文化建设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提供丰富的实践总结、珍贵的价值理念、有益的学术参考和创新的思想理论资源。

凤凰文库将致力于人类文化的高端和前沿,放眼世界,具有全球胸怀和国际视野。经济全球化的背后是不同文化的冲撞与交融,是不同思想的激荡与扬弃,是不同文明的竞争和共存。从历史进化的角度来看,交融、扬弃、共存是大趋势,一个民族、一个国家总是在坚持自我特质的同时,向其他民族、其他国家吸取异质文化的养分,从而与时俱进,发展壮大。文库将积极采撷当今世界优秀文化成果,成为中西文化交流的桥梁。

凤凰文库将致力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和现代化的建设,面向全国,具有时代精神和中国气派。中国工业化、城市化、市场化、国际化的背后是国民素质的现代化,是现代文明的培育,是先进文化的发

展。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进程中，中华民族必将展示新的实践，产生新的经验，形成新的学术、思想和理论成果。文库将展现中国现代化的新实践和新总结，成为中国学术界、思想界和理论界创新平台。

凤凰文库的基本特征是：围绕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这个中心，立足传播新知识，介绍新思潮，树立新观念，建设新学科，着力出版当代国内外社会科学、人文学科、科学文化的最新成果，以及文学艺术的精品力作，同时也注重推出以新的形式、新的观念呈现我国传统思想文化的优秀作品，从而把引进吸收和自主创新结合起来，并促进传统优秀文化的现代转型。

凤凰文库努力实现知识学术传播和思想理论创新的融合，以若干主题系列的形式呈现，并且是一个开放式的结构。它将围绕马克思主义研究及其中国化、政治学、哲学、宗教、人文与社会、海外中国研究、外国现当代文学等领域设计规划主题系列，并不断在内容上加以充实；同时，文库还将围绕社会科学、人文学科、科学文化领域的新问题、新动向，分批设计规划出新的主题系列，增强文库思想的活力和学术的丰富性。

从中国由农业文明向工业文明转型、由传统社会走向现代社会这样一个大视角出发，从中国现代化在世界现代化浪潮中的独特性出发，中国已经并将更加鲜明地表现自己特有的实践、经验和路径，形成独特的学术和创新的思想、理论，这是我们出版凤凰文库的信心之所在。因此，我们相信，在全国学术界、思想界、理论界的支持和参与下，在广大读者的帮助和关心下，凤凰文库一定会成为深为社会各界欢迎的大型丛书，在中国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中，实现凤凰出版人的历史责任和使命。

凤凰文库出版委员会

献给我的爱妻珀尔

理念和行动的无尽循环，
无尽的创造，无尽的实验，
带来运动的知识，而不是静止的知识；
带来言说的知识，而不是沉默的知识；
带来语词的知识，却忽略了语词。

——T. S. 艾略特

《岩石》合唱词

译者的话

—

丹尼尔·贝尔(Daniel Bell)是美国当代著名社会学家、思想家和学者,哈佛大学荣退教授,他对美国战后社会政治、经济和文化等诸多方面都提出了深刻的洞见,多部力作至今仍然是研究美国社会文化的必读书目。

丹尼尔原姓布洛茨基(Bolotsky,其叔父后来将家姓改为 Bell),1919年出生于美国纽约布鲁克林一个东欧犹太移民家庭。8个月时,贝尔的父亲就去世了,母亲带着他和哥哥寄居亲戚檐下,靠在一家服装厂长时间工作,才勉强维持自己和两个儿子的生活。儿童时代的贫穷与挣扎,以及作为犹太人被主流社会排斥的心理感受,让贝尔很早就产生了追求公平和平等的渴望。

1938年,贝尔毕业于纽约城市大学社会学专业,接着又在哥伦比亚大学读了一年硕士。1960年他获得哥伦比亚大学博士学位,博士论文《意识形态的终结:50年代政治观念的衰竭》即后来那本同名著作的原

型。贝尔最初的工作是杂志编辑,1941—1973年间曾担任《新领袖》(*The New Leader*)、《财富》(*Fortune*)和《公共利益》(*The Public Interest*)等杂志的撰稿人和编辑。贝尔的另一职业是教师。40年代后期开始,贝尔在芝加哥大学社会科学学院担任讲师,并先后在哥伦比亚大学和哈佛大学教授社会学,一直到1990年退休。2011年1月25日,他在马塞诸萨州剑桥家中去世。

贝尔可谓欧美思想界的重要人物。1964年,他被遴选为美国艺术与科学学院成员,并于2000年担任主席。1964—1965年间,他是总统技术咨询委员会成员,1978年,他又是总统制定80年代国家计划委员会成员。1992年,他获得美国社会学协会终身成就奖。

虽然家庭背景和青少年时代的经历让贝尔天然对马克思主义有好感,也曾在年轻时上街宣传革命思想,并熟读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各种著作,但随着年龄增长,思想渐趋成熟,贝尔与当时被称为“纽约知识分子”的新自由主义群体越走越近。不过,激进左翼思想的过于好斗,非暴力手段达致工会目标的无力,让贝尔不仅对极左和极右思潮都满怀警惕,也意识到单靠左翼或右翼思想都无法彻底解决社会矛盾。在战后的文化大反思与讨论中,贝尔逐步确立了自己的学术立场,那就是既抨击麦卡锡主义反共、反民主的极右保守主义,也不赞同激进社会主义革命的暴力手段与“乌托邦”倾向,而是寻找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之间的“第三条道路”。如果要用一句话定义他的根本观点,那就是他在这本《资本主义文化矛盾》中所说的:“我是经济学领域中的社会主义者,政治领域中的自由主义者,文化领域中的保守主义者。”

二

贝尔的青年时代正处于30年代美国经济大萧条时期。极富好奇心的他一直想探究个中原因:按说美国应该是个伟大的国家,可为什么这

一切会发生？可以说，对这些问题答案的追寻构成了贝尔一生钻研思考的对象，也是他三本名著《意识形态的终结》(*The End of Ideology*, 1960)、《后工业社会的来临》(*The Coming of Post-industrial Society*, 1973)及《资本主义文化矛盾》(*The Cultural Contradictions of Capitalism*, 1976)的主题。在《意识形态的终结》中，贝尔宣布源于19和20世纪初的人文意识形态，已无力指引当今社会的发展方向；而这个发展中的社会，就是他在《后工业社会的来临》中勾勒的后工业社会。在贝尔看来，信息成为控制经济的核心后的工业社会不久就将取代工业社会，它的特征是经济重心由制造业转向服务业，工业以科技为基础，社会将出现新的技术精英和新的社会分层原则。

几十年来，社会历史的发展印证了贝尔的大部分看法。贝尔之所以有这些真知灼见，不仅在于他对社会的敏锐洞察和深刻批判，也在于他看待问题的独特角度与研究方法。这一点在《资本主义文化矛盾》里尤为明显。与以往大部分学者将社会看成铁板一块，试图从整体来阐释世界不同，贝尔明确指出，现代社会是政治、经济、文化三个截然不同领域的不协调混合，而这三个领域又被互相对抗的轴心原则所统治：对经济来说，是效益；对政治来说，是平等；对文化来说，是自我实现和自我表达。资本主义文化或者说资本主义社会的矛盾，就来自于政治、经济和文化这三个领域的分裂，来自于效益、平等和自我实现之间的冲突。同时，在此书中，贝尔还认为，资本主义源于自制、谨慎、简朴的清教思想，后者主张先劳动后享受，以工作而不是消费为天职，这种精神大大促进了资本主义的产生与发展；但是资本主义文化却制造出一种不加限制地追求即时自我满足的欲求，鼓吹“没有什么是神圣的”，大大伤害了资本主义社会。

在《资本主义文化矛盾》一书里，贝尔不仅详细分析了资本主义社会三个不同领域和各自领域的轴心原则，追溯了这些领域的冲突造成的文化矛盾，也试图对这些矛盾给出自己的解答。他主张在经济领域遵循社

会公平原则,以共同体而不是个人的价值为优先考虑;在政治领域则遵循自由方针,个人而非任何群体才是政治的首要参与者,而且社会应有一定的奖赏标准来回报个人成就;在文化领域提倡尊重传统,相信对艺术质量的判断有一定的客观标准和权威意见。在各种矛盾让资本主义社会似乎有走入穷途末境之危险时,贝尔大力呼吁宗教的力量。他所谓的宗教不是单纯的信仰,而是“一种精神,一种关于超越我们的、且不能被侵犯的事物的精神”。在贝尔看来,有传统和宗教作为我们的底基、依靠和指引,人类也许能在迷惘中确定界限,为充满矛盾和冲突的社会重新确定前进的方向。

《资本主义文化矛盾》初版于1976年,1996年再版时,贝尔为之撰写了长达数万字的后记。在后记中,贝尔不仅进一步强调和深化了原书的中心内容,也对21世纪后半叶的后现代社会、全球化经济、文化与阶级的新动向做了一番介绍。作为战后最具影响力的百本著作之一(1995年由《泰晤士报文学增刊》评出),再版后记有关后现代消费文化的畸形发展、所谓相对主义对文化传统的戕害、亚洲(中国)世纪的到来等见地,再一次印证了贝尔的思想智慧及此书在历史中的重要性。

此书分析的虽然是美国社会,但对中国读者来说,也颇具启发性,尤其是在后现代全球化经济的裹挟下,如何为个人和社会谋求更美好的未来,相信贝尔此书能给我们一个借鉴。译者才疏学浅,面对如此厚重分量之作,只求尽量传达作者原意,若有疏漏之处,还请读者指正批评。

1978 年再版前言

I

那位博学多才的塞缪尔·约翰生(Samuel Johnson)认为,任何一个心智健全的人都不会将一本书从头读到尾。他自己的方法就是将书快速扫一遍,只阅读那些令他感兴趣的部分,而跳过其他所有章节。 xi

这是了解一本书的一种办法,对聪明的读者来说,也许就已经足够了。但是,这些年来,许多人并不真正阅读书籍,而是草草过一遍,且通常是从评论家那里了解一下。考虑到传媒的局限和文化的本性,这种知识隔了一层,有一定危险。首先,即便一本书有复杂论点,评论家——他们可是大忙人——也会急速扫一下全书,找出几句话压缩成论点,然后找个标签,把作者放进时髦评论语汇的合适专项中。如今在美国,自由主义思想偏见占据主流,一个论点若和自由主义相悖就会让一些评论家不甚舒服。而那些抨击当代文化某些方面——这些方面太随意地声称自己宣扬“解放”——的著作,其作者就会发现自己被贴上了“新保守主义”的标签。

这类标签就其本身用语来说毫无意义。因为它假设社会观点可以

沿单一维度结队成列。(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事实上,那些攻击“单向度”社会的人常常持有此种单向度政治观点。)在更大的历史语境中,“新保守主义”这种描述更没有道理,因为我所致力文化批评——我想,类似的批评家还有彼得·伯杰(Peter Berger)和菲利普·瑞夫^①(Philip Rieff)——已超越了自由主义被普遍接受的范畴,试图在一个不同的框架内来思考当代社会的困局。

既然一个作者的观点跟读者对他意图的理解有关,那么,我想我这么说没有错:我是经济学领域中的社会主义者,政治领域中的自由主义者,文化领域中的保守主义者。这种表述可能会让不少人感到困惑,因为他们认为,如果一个人在一个领域中是激进分子,那么在其他所有领域中,他也是激进分子;反过来,如果他在一个领域里是保守分子,那么在其他领域里他也必须持保守观点。在社会学意义和道德意义上,这种看法都误读了这些不同领域的本质。我认为我的观点里有种内在一致性,我希望在此前言中清楚地表述出来。我想先说一下我持有的价值观,然后在接下来的章节中解释它的社会学差异。

关于经济学:如今的经济学领域通常被认为仅仅是工具性的。这本书的一个主题是,资本主义社会在对积累的强调中,使积累活动本身成了目的。但是没有任何一个道德哲学家——从亚里士多德、阿奎那到约翰·洛克和亚当·斯密——将经济从一系列道德目标中拆分出来,或认为创造财富本身是个目的;相反,创造财富被视为实现德行、引导文明生活的一种手段。

现代经济学则变成了一种“积极科学”。其中,所追逐的目标被认为是个别的、变化的,而且,在互相竞争的各种目的之间分配资源的过程中,经济学只是“手段”的科学,或理性选择的科学。但是,价格体系只是一种机制,它在生成的各类需求所构成的框架中,对商品和服务进行相对配置。而这些需求来自于现有的收入分配。此外,最终指导经济的还

^① 彼得·伯杰和菲利普·瑞夫,均为美国著名社会学家。——译注

是经济深植于内的文化价值体系。经济政策作为一种手段可以是有效的；但只有在构塑它的文化价值体系内，它才合理。

正因为这个原因，我是经济学领域内的社会主义者。对我来说，社会主义不是经济中央集权制或生产资料的集体所有制。它是对经济政策优先权的判定。因为这个原因，我认为，在这个领域中，在判定经济政策合法的价值观方面，共同体比个人优先。因此，社会资源的首要留置权，是应建立起一种“社会最低限度”，让个人可以过一种有自尊的生活，成为集体的一分子。^① 这意味着一套劳动优先制度，以保证那些寻找工作的人有抵御市场风险的一定程度的安全感；另外也要能得到充分的医疗保健和抵御疾病伤痛之损害的保障制度。

xiii

我承认需求(need)和欲求(want)之间的古典区分，此书中我也重新解释了这种区分。需求是作为“物种”成员的所有个体都有的；而欲求则是跟个人各自不同口味和特质相应的不同欲望。我认为，一个社会的首要责任是满足基本需求；否则，个人就无法成为社会的完全“公民”。诚然，“需求”这个词很模糊。凯恩斯(J. M. Keynes)曾这么写道：“确实，人类的需求似乎是贪得无厌的。但这些需求分为两大部分——一种是绝对需求，即不管周围人情况如何，我们都会感觉到这种需求；一种是相对需求，即只有其满足让我们感到高高在上，感到自己比同伴优越，我们才会感到这种需求的

① 现代思想的转折点始于边沁(Jeremy Bentham)。边沁认为，所有人都渴求幸福，这幸福就是最大限度的快乐和最小限度的痛苦。在实践中这意味着只要个人认为这是对他有利的，都可以成为追求的“目的”。亚当·斯密除了《国富论》外还写了一本《道德情操论》(*The Theory of Moral Sentiments*)，其中，一位“公正旁观者”代表着共同体的意见，所有正常思维的人都必须认真考虑这意见。但是，对边沁来说，他在《道德与立法原理导论》(*Introduction to the Principles of Morals and Legislation*)中说“共同体是假想物”，集体利益应是“构成集体之成员的各自利益的总和”。

现代资本主义思想接受了这个有害观点，因为建立(或大部分建立)在个人利益上的法律在道德上站不住脚。正如我的同事欧文·克里斯托(Irving Kristol)指出的，经济学必须以规范考虑为界——不管将个人决定集中起来之后，其结果是否正义或公平。任何社会都无法逃脱对什么是合适的、什么是理想的做出合理判断，也不能不对依据那些标准而作的经济决策的后果进行评估。

存在。第二类需求,能满足我们想要觉得优越的欲望,它们才确实是无休无止的……但绝对需求不是如此。”^①

在本书中,我追随亚里士多德及后来托马斯·阿奎那的区分。阿奎那指出,对金钱的欲望永无止境——这就是为什么天主教会限制高利贷和价格的自由制定。但是需求以食物、衣服、居所及此类事物体现出来,它有界限,这界限由使用者的能力设定。

现代经济于无意中在需求和欲求之间建立了自己的区分,即自由支配的收入这个概念。一个人开销的一部分是相对固定的——满足自己定义的基本需求(或用凯恩斯的话来说,是绝对需求)的必要支出。另一部分却是多变的:它可以被延缓,用来满足各种不同欲望,而且常常花在对表明地位及体现优越感之事物的追逐中。

xiv 我支持的社会最小限度,就是可以满足基本需要的家庭收入总额。而且,因为社会最小限度也是个文化定义,所以,可以理解,它也随着时间流逝而改变。^②同样,因为我是个社会主义者,我不认为财富可以兑换成与它无关的领域内的不适当特权。所以,因为有钱,就要求医疗设施的不恰当特权,是不对的(见边码第 260 页起),因为它们也是社会权利,所有人都可以得到。在财富、地位和权力领域中,每个领域都有各自的公平分配原则。

然而我也是政治领域中的自由主义者——这两个词的定义都是康德意义上的。我是个自由主义者,我认为在政治中,个人,而不是群体(无论是家庭、公司、教会,还是种族或少数群体),应该是首要参与者。对于政治而言,我认为它应该维护公众和个人间的区分,所以不是所有

① 凯恩斯《我们后代的经济前景》(“Economic Possibilities for Our Grandchildren”),见《凯恩斯文集》第九卷《劝说集》(*Essays in Persuasion*, London: Macmillan, 1972, p. 326)。

② 我的同事李·雷恩沃特(Lee Rainwater)在一系列实例研究中发现,当生活背景相当不同、来自不同种族的工人阶级被问及多少金钱能给他们一个“体面”生活时,答案总集中在一个共同数字上——社会中等阶级收入的一半。见雷恩沃特,《钱可以买什么》(*What Money Buys*, New York: Basic Books, 1976)。

行为都是政治化的——共产主义者就这么认为；或者都有限制——就如传统资本主义社会中放任政策的合理化过程那样。

公共领域在平等适用于所有人的法律下运行，因此也是程序性的：它并不详细区分个人间的不同；它平等对待众人，而不是想“使他们”平等。私人领域——道德上和经济上——是这么一个领域：意见一致的团体做出自己的决定，只要其后果（比如色情文学或环境污染）不扰乱公共领域就行。

我相信个人成就原则，而不是社会地位的继承或指定的分配。但我不是流行、时尚意义上的平等主义者，时髦观点认为，法律应该使得众生平等——这种情形事实上不是平等，而是数字配额的体现。我之所以要区分需求和欲求，是因为我不明白如何在经济领域中做到收入平等。对工资差异的坚持——工人中这种想法最强烈——反映出一种道德直觉：不同的技术和努力，应该得到不同的报酬。一旦创建了社会最小限度，那么人们如何处置他们钱的剩余部分（只要服从不得违法兑换的原则），是他们自己的事，就像人们在道德领域内的所为同样也是他们自己的事一样，只要是私下进行的就行。而且，如果社会普遍存在竞争，那么，我认为，奖赏标准就是回报个人社会成就的公平原则。 XV

我是文化领域的保守主义者是因为我尊重传统；我相信对艺术作品质量好坏的合理判断；而且我认为在判断经验、艺术和教育的价值时，权威原则是必要的。

本书将表明，我所使用的“文化”一词，决不像人类学意义上那么宽泛、包罗万象，人类学可以将任何一种“生活方式”都定义为一种文化；不过，我所谓的“文化”也要比贵族传统所定义的要广，贵族传统把文化限定在精致艺术和高雅艺术上。对我来说，文化是想对生存困境提供一系列内在一致的应对的努力，所有人在他们的生活过程中，都会面对这些困境。（见边码第12—13页）所以，对一种文化的生命力来说，传统变得至关重要，因为它提供了记忆的连续性，这些记忆告诉我们，前辈在面临相同生存困境时是如何应对的。（这就是为什么赞美诗作者这么说：“如